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2.03.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贾莹.“西部来信”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以萨缪尔·鲍尔斯《我们的新西部》为中心的考察[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79-192.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2.03.001.



Citation Format: JIA Ying. "Letter from the West" and America's nation-building: A study of Samuel Bowles' s *Our New West*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3): 179-192.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2.03.001

“西部来信”与美国的国家建构 ——以萨缪尔·鲍尔斯《我们的新西部》为中心的考察

贾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美国内战后,以西部见闻为主题的旅行书信在各大报纸上涌现,记者、文人和政客通过风景话语参与国家重建和文化重塑,“西部来信”在此意义上成为美国认同的一种文化载体。《共和党人报》记者萨缪尔·鲍尔斯于1865、1868年加入由联邦官员主持的两次西部之行,据此撰写的旅行书信在当时具有代表性,集结为《我们的新西部》一书。其中,关于太平洋铁路、大平原和印第安部落的叙述为经历战争创伤后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凝视和想象共和国的入口。首先,鲍尔斯将太平洋铁路作为联合各州的文明纽带,借助“铁路现代性”触发的与历史的“断裂”意识,促使人们遗忘过去,看向未来,并预设了一副美国“天命论”之下的“统一的帝国风景”,旨在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做铺垫。其次,作者笔下的大平原形象经历了从“大沙漠”到“大牧场”的转变,“荒地变花园”的拓殖神话有助于调动起美国人攻克“最后一块边疆”,进而征服整个北美大陆的普遍愿望,联邦在地理空间和文化象征层面的不可分割性得到了重申。最后,印第安部落在西部的迁徙和游荡被处理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以佐证白人至上主义,强调盎格鲁-美利坚人天然享有美洲土地的归属权。而印白冲突在文中的夸大化所激起的种族仇恨,一方面弱化了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在想象“野蛮他者”的同时界定了民族自我。经以上描写,西部被塑造造成南北和解的场域、“大陆帝国”的缩影,以及上帝赋予清教徒的“应许之地”,作者以此架构起以“重聚”为核心的国家前景、国家身份和文化共同体。但这样的“新西部”传递的是征服者(白人定居者)和胜利者(北方联邦)建立的知识秩序,由此形成的报刊民族主义话语看似整合了相互冲突的地方观念,激发起一种广泛的、无差异的美利坚民族性,实则未能成为弥合分裂的利器。同时,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进步观、土地开发假说和文明等级论等,反而加剧了重建时期的社会动荡,透露出美国国家建构中的内在矛盾与分离危机之根源。

关键词:美国内战后;“西部来信”;萨缪尔·鲍尔斯;“新西部”景观;认同话语;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G212.2;D7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3-0179-14

基金项目: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创新项目“帝国扩张、文学生产与‘美国西部’的绘制”

作者简介:贾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Email:jiaying2090@126.com。

美国内战之后,从分裂的国土上诞生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联邦统一和西部扩张为构建一个横跨大陆的帝国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现实基础,也产生了重新定义美国,形成一套共同话语体系的历史时机。在此背景下,西部旅行之风在新闻记者和文人政客中盛行,其经历和见闻往往以公开信的形式刊载于各大报刊,后集结成册出版,报载旅行书信(newspaper travel letters)流行一时^①。这类“西部来信”将一副新的国家图景带入大众视野,搭建了一个“在公共领域内通过印刷话语想象共和国自我形象”的文化政治空间^②,强调的是消弭了南北分歧的美利坚性。这样的情感经验源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拓殖者(无论来自南方潮水区还是北方新英格兰地区)向西部迁移、扩张和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进步”的心理体验,以及面向陌生“荒野”及所谓的“野蛮人”时催生出的有关“文明”的自我认同。当它被包装成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出现在战后的废墟中,并试图唤起一套崭新的意识形态来抵消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地方情绪时,便构成了有意识的文化建构行为。对此,学界往往从南方或北方视角考察国家重聚和文化重建的相关问题,而较少注意到西部及西部书写的独特价值,以及书写者如何在风景中制造了战后的美国国家身份认同。

萨缪尔·鲍尔斯根据1865、1868年两次西部之行创作的书信影响极大,作为《共和党人报》^③的出版商、编辑和撰稿人,其书信最初写给该报读者,分别集结为《穿越大陆》^[1]和《美国的瑞士》^[2]两册,后修订合并成《我们的新西部》^[3]。这些书信“恰逢其时”地为美国公众提供了一扇透视战后“新”国家的窗口,西部作为一味转移焦虑和治愈创伤的解药被开出,预示着上升的帝国之路。这也是其书信在当时得到美国社会和新闻界肯定的原因^④,而当代美国学者也予以了正面评论^⑤。这些

①19世纪以来,美国公众对欧洲和北美远西部等“遥远地区的浪漫与冒险”产生兴趣,旅行书信几乎成为每份美国报纸的必要部分,其内容和形式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标准,并产生了一批报刊旅行专栏作家。参见:GREENE C M. Letters home: Newspaper travel writing of Kate Field, Mary Elizabeth McGarth Blake and Grace Greenwood [D]. Pennsylvania: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1. 随着定居者深入西部的条件逐渐成熟,以西部旅行为主题的书信在内战前后涌现,霍勒斯·格里利《1859年夏天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陆路旅行》是其中的范本,最初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内战后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贝亚德·泰勒《科罗拉多:夏日旅行》,最初刊登于《纽约论坛报》;亚历山大·麦克卢尔《穿越落基山脉三千英里》分别发表在《纽约论坛报》和《富兰克林知识库》;詹姆斯·罗斯和乔治·加里《从威斯康星至加利福尼亚的往返之旅》刊载于《威斯康星日报》;格蕾丝·格林伍德《新土地上的新生活》发表于《纽约时报》。此外,战后美国进一步将扩张触角伸向亚太地区,相应地产生了海外扩张主题旅行书信,如1866年马克·吐温作为派往夏威夷的记者,为《萨克拉门托联合报》所写的旅行书信,亦称《夏威夷来信》。详见 GREELEY H.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New York to San Francisco, in the summer of 1859 [M]. New York: C. M. Saxton, Barker & Co., 1860; TAYLOR B. Colorado: A summer trip [M]. New York: G. P. Putnam and Son, 1867; MCCLURE A. Three thousand miles through the Rocky Mountains [M].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69; ROSS J, GARY G. From Wisconsin to California and return [M]. Madison: Atwood and Rublee, Book and Job Printers, Journal Blook, 1869; GREENWOOD G. New life in new lands: Notes of travel [M]. New York: J. B. Ford and Company, 1873; DAY A G.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5.

②迈克尔·沃纳谈及民族主义修辞学与新闻、印刷和出版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尽管民族国家是18世纪的产物,民族想象却产生于19世纪,印刷业与民族的自我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详见 WARNER M.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0.

③全称《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其周刊由老萨缪尔·鲍尔斯创办于1824年,鲍尔斯从父亲手中继承该报后于1844年创建了日报,并作为编辑和撰稿人直到1878年去世。该报不仅覆盖马萨诸塞州,在北部和西部也有大批读者,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1860年底,日报发行量达5700份,内战期间扩大了两倍,1860年周刊发行量为11280份。参见:拉维德·G. 布莱雅. 美国新闻事业史 [M]. 王海, 刘泉,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12.

④作为内战前后新闻界的领军人物,鲍尔斯的旅行书信一经发表就受到广泛关注,并被其他出版物转载,尤其是《穿越大陆》,经《纽约时报》《北美评论》和《波士顿环球报》等著名报纸推介后,其公共意义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

⑤卡特丽娜·J. 奎因在其博士论文中肯定了《穿越大陆》中的新闻哲学,从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对报载旅行书信的文学传统、审美形式、政治话语等展开分析,并在另一篇论文中考察了《穿越大陆》中的民族主义思想。详见 QUINN K J. Journalism, letters, and nation: The newspaper letters of Samuel Bowles's across the continent (1865) [D]. Pennsylvania: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7; QUINN K J. "Across the continent and still the Republic!" Inscribing nationhood in Samuel Bowles's newspaper letters of 1865 [J]. American Journalism, 2014, 31(4): 468-489.

评价虽然抓住了书信的国家维度,但未能在复杂的历史和话语场域中触及鲍尔斯的旅行及写作。如果不以内战前后西部文化政治的变动为切入口,将西部扩张置于南北分裂的历史演进中,并结合报刊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关系,便很难把交织在文化建构内外的根本性因素纳入考察范围。鉴于此,本文借由鲍尔斯对太平洋铁路、大平原和印第安部落的描摹和想象,拟探讨如下问题:“新西部”景观何以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文化主体因何在西部与盎格鲁-美利坚人的自我想象之间建立关联?美国疆域在地理空间上的连续性如何刺激了“大陆帝国”身份意识的增强,并激发对美国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再发掘?鉴此,尝试从西部视角深入内战后美国国家建构的内在纹理。

一、报载旅行书信形式下的文化政治

1865年5月,鲍尔斯开启了第一次西部之行,行程由美国众议院议长、未来的副总统舒勒·科尔法克斯主持,同行者包括伊利诺伊州副州长兼《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威廉·布罗斯和《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作家阿尔伯特·理查森,他们游访了密苏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向北经过俄勒冈和华盛顿,抵达温哥华岛后返回旧金山。此时太平洋铁路^⑥还在修建中,鲍尔斯先乘火车从斯普林菲尔德到达密苏里北部,之后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直到在普莱瑟维尔再次搭上火车。1868年8月至9月的科罗拉多之旅是其第二次西行,他们从芝加哥抵达奥马哈,沿联合太平洋铁路一路向西至丹佛附近,探访了科罗拉多的平原、山脉、湖区、矿区、铁路城镇及公园。根据作者的自述可知两次西行目的:了解西部的投资契机,考察采矿业和铁路公路铺设的情况,鼓励移民定居和开发西部,调查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掌握摩门教的动向,并以旅行书信形式向公众展示合众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和未来,向世界证实美国文明的进步性^{[3]28}。从同行人员来看,鲍尔斯的两次西行均体现了党派政治上的倾向性^⑦。此外,1865年的旅行还因亚伯拉罕·林肯的支持而更像一次携带“公共使命”的考察^⑧。

事实上除了战争期间,这类带有明确目的性的“西行”在内战前后不在少数,相应的“西部来信”在当时引发了公众对西部土地的猎奇心,成为潜在移居者了解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主要途径;同时,通过呈现新的国家风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因战争而产生的悲观和质疑。然而,在美国报业团体与党派政治结为利益联盟的背景下,报刊是政党或社团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在这些刊载于日报或周报的旅行书信中,“西部”根据“所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读者由此获取的信息大多建立在带有导向性的宣传之上。“报纸和编辑是政治进程中有意图的行动者,将政党、选民和政府联系在一起,并追求特定的政治目标。报纸是19世纪政党政治的‘关键’”^[4]。为了掌控话语权,不少政党因此成为新闻编辑或出版人,致力于培养各自的舆论阵地。

在一系列旅行书信中,鲍尔斯强调共和国的最大奇迹在于“她的子民那神秘的又确定无疑的同

^⑥ 又称“横贯大陆的铁路”,根据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授权,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向西铺设,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向东铺设,两条铁路线(中央太平洋铁路与联合太平洋铁路)于1869年在犹他州奥格登汇合。

^⑦ 科尔法克斯出身新闻记者,是共和党的创立者之一,他在担任议长期间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第十三修正案;理查德作为《纽约论坛报》的记者,在1863年5月报导内战实况时被南方军队囚禁,而该报主编格里利曾是辉格党的支持者,后参与创建共和党并鼓吹废奴制;布罗斯所供稿的《芝加哥论坛报》在内战前后立场鲜明地支持林肯;而《共和党人报》则是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主要阵地。其中理查德只参与了第一次旅行。

^⑧ 1865年4月14日,林肯遭遇刺杀的当天早上,与科尔法克斯在华盛顿会面一个多小时,他谈及落基山脉至太平洋沿岸潜藏的贵金属,认为应鼓励被遣散的士兵和欧洲移民前往西部山脉挖掘矿藏,以帮助联邦在经历叛乱之后偿清国债。详见 MOORE A Y. The life of Schuyler Colfax[M]. Philadelphia: T. B. Peterson & Brothers, 1868: 277-278.

质性”,使旧金山与纽约和波士顿燃烧着相同的爱国主义欲念,这种“同质性”还因对外来移民的包容而具有了世界格局,能够使“所有移民迅速同化”^{[1]160}。鲍尔斯的叙事意图得到科尔法克斯和布罗斯的赞许,二人充分肯定了书信的巨大价值,科尔法克斯在序言中写道:鲍尔斯的旅行素描无疑会激发美国人将他们的目光从欧洲转向美国西部,不仅有助于增长知识,而且会加强大西洋和太平洋各州之间的爱国纽带,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共和国^{[3]4-6}。

需要明辨的是,对于刚刚从一场分裂危机中重生的联邦而言,这里的民族想象和国家认同主要由谁发出?代表了怎样的立场?查尔斯·彼尔德将内战界定为一场种植园贵族遭到毁灭,北方资本家和自由农场主的新联合获得胜利的社会革命^[5],这场“革命”使南部的连同奴隶制在内的经济基础被粉碎,参与“叛乱”的南方官员的政治权力被剥夺;而北方的制度和体制向整个北美大陆扩展,关于战争合法性的解释也延续了林肯及共和党的那套话语。在战后北方把控言说权的历史叙事中,蓄奴州脱离联邦被视为一场非法叛乱,北方则被塑造成阻止国家分裂的正面形象。投降后的南方一蹶不振,经受了经济、政治和人口的重创之后,在心理和情感上无法对“统一的联邦国家”产生认同,从战后南部老兵发起的各类英雄纪念活动,文化精英团体针对南部事业正义性的辩护,以及对南方精神的捍卫可知,内战后至20世纪初,始终存在一股强大的力量试图从文化上复兴南方传统,对抗激进重建并构建邦联意识形态^[6]。可以说,北方虽然以战争为代价使南部邦联重新回归联邦,但南北之间的内在分化并未因政治上的统一得以解决,民族和解远未到来。此时致力于建构新的国家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出自北方共和党的意愿。

《共和党人报》在内战前曾支持辉格党,后因辉格党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的动摇,转而呼吁成立了共和党。虽然鲍尔斯在1855年2月3日的一篇社论中声称要保持新闻报刊的“独立”姿态^[7],创办像《伦敦时报》那样的一流公众报纸,但在林肯参选时和执政后,他都予以全面支持,并强调《共和党人报》所代表的是新英格兰的利益和诉求^[8]。事实上,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共和党仍然代表北方的利益,被其追随者称之为“拯救联邦的政党”。作为《共和党人报》的代言人,鲍尔斯与科尔法克斯和林肯一同被埃里克·方纳归为“温和派共和党人”,不同于共和党内的激进派坚持对南部联盟进行军事管制和剥夺选举权的方案,温和派主张采取宽大政策使南部重归联邦^[9]。《共和党人报》向公众展示这样一种相对圆通的政治立场,提倡从文化和制度上对南方进行北方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鲍尔斯勾勒了一副民族和解的景象,但他将内战视为北方从道义到精神上的获胜,其立场倾向明显。作为胜利的一方,北方共和党希望从巨大的牺牲中寻求战争对于联邦统一的意义,于是“新西部”被创造出来作为美国人“英勇斗争”后的回报。

二、作为文明纽带的太平洋铁路:国家重聚的现代化前景

西部能够进入战后北方的“认同”话语体系,与它在南北冲突中的转向有关,而这种转向又极为典型地体现在“铁路经济”及“铁路意象”在内战前后的变化当中。长期以来,西部一直是南方与北方斗争的核心利益所在,双方基于土地产生的不同国家理念导致西部扩张进程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⑨,美国分别向西北部和西南部的领土扩张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扩展。正如

^⑨19世纪40、50年代,美国陆续兼并了俄勒冈、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等地,而在新增领地内允许或禁止奴隶制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争斗的焦点,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和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颁布非但没能缓和矛盾,反而导致了“堪萨斯内战”和激烈的党派斗争,加剧了分裂。

“天定命运”虽然泛指 19 世纪美国人的扩张情绪,但实际上在 19 世纪上半叶至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扩张论”,南方种植园贵族的土地获取与扩大蓄奴制的目标捆绑在一起,而北方资本家、农场主和劳工对自由土地的追求是一种不包含奴役关系的扩张。北方民主党人约翰·奥沙利文在 1845 年美墨战争前夕提出这个口号时,显然有意回避南北方不同的帝国野心,只展现出一个模糊的、普遍适用的帝国愿景^[10]。

在南北争夺西部这一“战利品”的过程中,铁路交通在建立东北部与西部的联盟、割断南部与西部的关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 世纪前期,南方大部分地区与西部的经济往来是借助内陆河流网络,而东北部与西部之间被山脉阻隔,需要修建一条横贯大陆的通道打破这种天然屏障。因此北方资本家和商人希望通过铁路将西部的命运与美国联邦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种植园制度发展到落基山脉以西的地区。1830—1840 年间,西部的投机热把东北部的银行家、铁路商、工人与西部廉价土地绑在了一起,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随着西部准州陆续加入联邦,二者在文化上的纽带也逐渐牢固。按照雷·艾伦·比林顿的说法,“每英里轨道的铺设,或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或跨越西部各州,不仅使西部和东北部形成在商业上的相互依存,而且使两个区域感到在反对南方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思想意识。双方不为人知地结合成了一个区域:北部”^[11]。19 世纪 60 年代,一系列重要迹象都显示北方联邦已经逐渐掌控西部^⑩,南方战败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片领土便落到了获胜的农场主和资本家手中,西部土地的性质被彻底改变。

此时,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不仅在现实意义上建立了东部与西北部、西南部联通的可能性,更充当了一种文化心理意义上的符码,即鲍尔斯所谓的“目前联合各州的纽带和使之永久化的手段”,“是以最廉价、最可靠和最甜蜜的方式延续文明的民族性,使共和国从一个海洋连接到另一个海洋”^{[1]257}。早在 1865 年,即使只有部分路程搭乘火车,但鲍尔斯已经捕捉到了机器具有的将伤痕累累的南方和北方统合在一起的那种力量,他写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啊,拯救、重聚、前所未有的地团结在一起,在这样的个人道路和脚步下扩展;它的领土多么宏伟;它在物资、道德和政治上的可能性与前景多么深远,且令人情绪高涨!”^[11]到了 1868 年,太平洋铁路即将竣工,鲍尔斯把这项“时代的伟大工程”与美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如今,太平洋铁路跨越了海洋水域之间的分割线。我们跨坐在大陆山脉的顶峰,看到大西洋斜坡上的最后一条铁路和太平洋上的第一条铁路紧紧牢系在一起。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国家生活的时代”^{[2]7}。

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将大西洋至太平洋之间的疆域连接在一起,提升了国家在象征意义上的凝聚力,这种力量赋予了美国人一种超越欧洲的自信心。在鲍尔斯看来,铁路正在创造现代奇迹,它开启了财富的新世界和自然美的新世界,而美国移民只要乘火车跨越大陆,便可轻而易举地发现和占有。科罗拉多就属于这样一个胜地,鲍尔斯将它比拟为“美国的瑞士”,拥有“世界上最好山区的所有壮丽风景和隐秘前景”,此前的旅行者难以一睹风光,如今太平洋铁路将瑞士带到了美国人的家门口^{[2] 29-31}。

然而,这种自我认同方式暴露了自独立以来美国人将欧洲视为政治和文化上的“他者”时所处的尴尬状态:既要寻求美国文化异于欧洲的独特性,又无法完全脱离欧洲影响而实现文化自立,这

^⑩林肯任总统后,赢得了几乎所有自由州的支持,共和党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北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纲领,包括提高关税、1862 年《宅地法》、补贴修建太平洋铁路等。这些政策逐步消除了西部成为蓄奴州的可能性。参见: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 II》[M],陈志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49。

一情形长期伴随着美国的国家建构。早在1855年,西部扩张主义者、太平洋铁路的鼓吹者托马斯·H.本顿就称科罗拉多为“美国的瑞士”,并写道:“我们美国人习惯于用欧洲来比较在我们自己国家想要赞扬的每一件事,尽管我们自己的可能要好得多;因此,我把这个山脉之州比作瑞士,尽管在比较中它被贬损了。它的山谷更美丽,它的山脉不那么崎岖,也更加肥沃——更适宜居住——气候温和,同样有益健康——道路更通畅……瑞士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12]虽然本顿极力想要证明美国地理环境的天然优势,但他和鲍尔斯同样都陷入了以欧洲作为参照的无奈。

在两部旅行书信中,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机械化的铁轨不但毫无违和感,反而衬托出非凡的机器力量和无可阻挡的美国“天命”,即:“大自然为火车铺设了一条横跨我们大陆的宏伟道路;山脉向左右两边倒退,——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只能捕捉到它们崇高的模糊轮廓,——但她在各处留下了古朴的废墟或雄壮的纪念碑,以纪念其伟力,使文明也许可以通过蒸汽力量从一个海洋抵达另一个海洋”^{[2]28}。太平洋铁路建成前夕,这类话语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各类报纸杂志和旅行手册中发酵,同时也在西部产生了回响。从亨利·乔治在1868年作为旧金山新闻记者时发表的《铁路将带给我们什么?》一文可知,即使像他那样的对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持有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者,虽然预见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可能造成的土地投机和贫富分化,但也不得不承认铁路作为未来发展的新力量,会在短时间内将荒野转变为人口众多的帝国^[13]。一种来自北方的工商业神话在内战后变得广为流传:过去属于野牛和印第安人的西部,或可能发展为种植园经济的西部,很快会随之消失,西部将变成像新英格兰和欧洲一样的文明之所。

W. J. T. 米切尔认为,风景是一种“文化表述的媒介”,具有双重的符号结构,象征权利关系的同时也充当权力的工具和手段,由风景形成的历史叙述往往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控制”有关,甚至是一个民族想象自身的核心^{[14]5-37}。太平洋铁路及其所连接的“统一的帝国风景”预告了一个现代美国的来临,它在空间上进一步确证了“大陆帝国”的版图,在时间上把整个疆域纳入一个“向前看”的未来。无论是刚刚过去的流血战争还是帝国进程中的奴役和杀戮,都被一一搁置,早期的边疆拓殖方式也遭到淘汰,那些曾经活跃在西部神话中的“拓荒者”则成了“更高文明的牺牲品”,而这一切都被当作现代化的必然。正像风景话语作为一种“伪历史神话”,是“把‘自然’纳入现代性合法化中的关键手段”^{[14]14},铁路在内战后的西部书写中成为不可忽略的意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所引发的现代性意识使人们在面对过去时带来的遮蔽效果,或称之为“与历史的断裂”,而新的“认同”正是通过这样的“断裂”才得以生成。

三、基于地缘意识的大平原想象:美洲大陆帝国的重申

内战中,西部曾为一部分不愿意卷入纷争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铁路商、土地投机分子和淘金者都是19世纪60年代向西进军的主角。战后,西部的经济开发成为整个国家的焦点,金银矿藏的发掘激起大批移民涌入落基山脉地区,以1862年的《宅地法》和《太平洋铁路法》为信号,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使美国白人获得西部土地的法律。这场西进大潮推动了他们对北美大陆的

最后一个“边疆”——大平原^①的占领,而根据内战之前的一系列探险报告^②,这一区域往往被视为没有开发价值的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带,不宜居住和农耕,是联邦政府抛给印第安人的“弃地”。长期以来这片“大沙漠”都是美国人西进路上的障碍,沃尔特·P. 韦布指出,“地图语言显示,美洲大沙漠在 1820 到 1858 年的记录中都存在”^[15]¹⁵³。

在 1868 年的考察中,鲍尔斯经过科罗拉多的中央大沙漠时写道:“没有一片沙漠,在通常的认识中是毫无价值的。”^[1]¹⁸“实际上,土壤是肥沃的,能与你们新英格兰的松原相提并论。它产出的草有粗有细,无论青草或干草,都是这片大陆能提供给牛的最好饲料。这片区域的确是这个国家的大牧场。这是它当前的用途和将来的利润所在。如今它支持着国家雄伟两翼的商业机器,既分离又连接在一起。当铁路取代牛和骡子时,它将用牛羊肉喂养我们,并供给不可估量的羊毛和皮革。那么,让我们不要轻视平原,要充分考量它们的能力”(Continent: 19)。通过以新英格兰松原作为参照,鲍尔斯突出了中央大沙漠的土壤肥沃程度,把它定义为未来的“国家大牧场”,而铁路交通更是增加了它可能的利润,把东部和西部两大经济区域连接在一起。早在 1860 年,后来的科罗拉多领地州长威廉姆·吉尔平就将大平原视为一片天然“牧区”,他认为这片区域虽然树木稀少、相对少雨,但气候利于健康,拥有一片沿河的从东到西的肥沃草原,土壤是松软的石灰质,耕地的比例相当大,谷物和水果可获得充足的阳光和灌溉,家禽和野兽蜂拥其间,自远古以来游牧的印第安人就以这些牧群为生,这块具有牧歌色彩的平原就是世界上的“牧场花园”^[16]。

从“大沙漠”到“大牧场”,鲍尔斯像吉尔平一样,向潜在定居者展示了大平原巨大的致富机会。在这类言论的鼓吹下,大平原很快成为农业、牧业和矿业开发的重镇,到 19 世纪末,该地区人口增长率超过 700%^[17]。表面上看,大平原形象的演变是地理考察的直接结果,但 18、19 世纪的此类“考察”往往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在新一波的占地需求下,文人学者托“科学”之名编织出各种假说来证明占领大平原的合理性,它们并非一种纯粹的知识,往往建立在对自然资源不加遏制利用的观念之上,且依托欧洲人“发现”和“开发”美洲的殖民实践。虽然大平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所变动,但韦布指出其三个基本特点^[15]³:(1)地形相对平坦;(2)树木稀少、未被森林覆盖;(3)雨量不足,不适合潮湿气候区常见的集约型农业,属于半湿润地区。由于该地区降雨量不稳定,许多牧场超载过牧,土地因盲目垦殖而变得荒凉贫瘠,最终导致席卷整个南部平原的沙尘暴,证实了大平原地区无论在生态上或经济上都无法承受过度的农牧业^[18]。

“大沙漠”观念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西进和移民的路线(绕过中部平原而向西北和西南进军),也延缓了白人对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的驱逐和杀戮。但随着探险队、商人和占地者不断进入大平原,沙漠形象逐渐由一种客观障碍变为征服神话中的一个隐喻,它声称降雨量会随着移民的到来而改变。这一信念经科考人员的“确证”和旅行记者的渲染得以普及。1867 年,斐迪南德·V. 海登领导“准州地质勘测队”在内布拉斯加展开调查,声称随着白人的拓居地不断扩大,雨量会逐年增加,使整个干旱地带发生变化,内布拉斯加密苏里河沿岸地区的气候将得到改善^[19]。这种乐观的

^①学界关于大平原的界定虽有差异,但大致指北美中部一块广袤的平原地区,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落基山脉以东、格兰德河以北。探险家古凡纳·K. 沃伦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政府考察报告中指出,西经 98 度以西至落基山脉之间的区域为大平原。

^②赞布伦·M. 帕克(Zebulon M. Pike)受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指示,于 1805 年和 1806 年两次进入北美西部探险,在探险日志中首次称落基山脉以东是一片不宜居住的贫瘠沙漠。1815 年,美国政府再次派遣队伍进入西部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以斯蒂芬·H. 朗(Stephen H. Long)为领队的远征队返回后也强调大平原地区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并在地图上将整个大平原标记为“美洲大沙漠”。

判断直接反映在鲍尔斯的书信中,他笔下的内布拉斯加是一个农业天堂:土地肥沃、气候均衡,在普拉提河与密苏里河的灌溉滋养下,燕麦、玉米和小麦的产量丰富、质量优良,密苏里和密西西比没有任何一个州的生产力可与之相比,鲍尔斯由此感叹“土壤都在嘲笑‘美洲大沙漠’的旧绰号”^{[2]14-15}。

“雨随犁至”成为美国人在内战后关于大平原的重要想象之一。对此亨利·纳什·史密斯认为,一方面,由于科学家误解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周期性降雨增加;另一方面,导致对平原经济潜力作出过高估计的原因还包括从“对国家命运的信心”到“人口流入西部带来土地增值”^[20]。实际上在这一进步话语中,“沙漠”并未消失,而被当成了一种可被文明人克服的“自然障碍”。马丁·J.波顿追溯了1820至1870年的半个世纪中“美洲大沙漠”地理概念的普遍存在,他认为,1865年之后的浪漫主义史学家虽然指出其虚假性,但他们并非否认沙漠环境,而是相信“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的入侵征服了减轻了沙漠的影响”——经过早期定居者的耕犁,土壤质量得到改变、降雨量增加、沙漠变成了花园^[21]。对于沙漠环境的强调突出了美国拓殖者非同寻常的毅力和智慧,尤其是通过“农业耕作”将一片荒地变为花园的政治神话,它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欧洲帝国对遥远异地的殖民占有过程中,这也是大平原的沙漠形象长期活跃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原因。

因而,从文化心理层面或许能够探查到大平原想象的深层结构。米切尔曾对建国以来美国人将大平原看作“沙漠”的固有观念进行了符号学式的解读,指出其中的圣经启示录意义:“美国荒原背负着犹太教与新教的共同‘使命’——流浪,严厉的考验,在沙漠中跋涉以寻找应许之地”^{[14]292}。这么一来,“雨随犁至”似乎应验了这个神学的地理解释,随着“考验”的结束,大平原变成了“世界花园”,美国人终于抵达“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西海岸,而“沙漠”作为一种帝国风景的意义就在于此。大平原想象的结构性转变中贯穿着古老的神学思维,似乎“美洲大沙漠”是19世纪美国探险家虚构出来一块空地。正像米切尔所洞察到的,“打开、发展这些形形色色的‘机遇之地’的风景,让沙漠开出花朵的将是那些上帝的选民。他们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昭昭天命、一个历史性的文明化使命、上帝的旨意,把它带给那些即将被驱逐或者毁灭的土著人”^{[14]295}。

实际上,这层符号象征意义的背后是美国人关于北美大陆的地缘政治思考。作为内战之后最后一块尚未被攻克的内陆土地,大平原的占领不仅是为了消除落基山脉和大沙漠可能造成的国家分裂,更在于消除美国的“腹地中心”被印第安人占据的隐患,从而形成一个在地理空间上连续的大陆国家。林肯在1861年的就职演说中告诉他的同胞,联邦就自然条件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区域间的战争无益于解决问题^[22]。他以地理上的“粘连性”来强调联邦的“永久性”,透露出对美国终将成为一个“跨越两洋的大陆帝国”的认知和信念。事实上从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开始,这种意识就伴随着美国人的西进,美国将吞并整个北美洲而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也是富兰克林、杰斐逊、昆西·亚当斯等早期建国者的国家设想。虽然这一帝国设想因南北冲突而中断,但当联邦获得统一后,即便落基山脉地区存在真实的沙漠环境,也无法再构成阻碍。

伯纳德·德沃托在《帝国的进程》中指出能够定义美国的两个事实:其一是美国的民族边界和帝国边界是相同的;其二是它的政治单元占据着大陆范围内相当连贯的地理单元^{[23]13}。在他看来,土地的连续性和整一性是“一种向心力,一种统一的、民族建构的力量”^{[23]407}。一个连贯的大陆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鲍尔斯关于大平原的描述显露出这种大陆帝国意识,通过将沙漠从地图上抹除,提炼出土地的潜在价值,召唤“美国公民”共同享有西部的红利,从而巧妙地绕开了曾经因土地引发的政治和经济争端,弱化了区域差异。由此,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象征意义上,大平原都成

为联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美国的大陆帝国形象在鲍尔斯这里也得到了重建。

四、印第安部落他者化:盎格鲁-美利坚共同体的确认

战后,美国定居者不断涌入西部,美洲原住民正面对被驱逐、屠杀和掠走土地的命运,他们在西部进行的最后挣扎被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纳入美国视野。白人旅行者在西部“观察”到的往往是步入衰亡的印第安部落、行将解体的印第安社会,以及贫穷、贪婪和嗜血的印第安人,与象征“文明”与“繁盛”的白人社会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在科罗拉多中部公园附近的山丘上,鲍尔斯以俯瞰视角描述山谷风景及谷中的犹他族印第安人:

这是一个开阔而美好的画面。左右相隔几英里,延伸着微型山脉,向前六英里以外,耸立着一道陡峭的灰色山壁;山脚下,穿过绿色草地,一条大河流淌而过;面向我们的的是一个平稳、干净、缓缓上升的坡路;一百顶白色帐篷沿着河岸支起,像远处的圆点,显示有六百到八百名犹他族印第安人扎营,正“饥肠辘辘”地等待我们的队伍到来;在更远处一个角落,山坡下,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雾气和蒸汽,弥漫于中央公园著名的温泉周围,整个公园就像一幅广袤、开阔的平原画卷,镶嵌在山峦中,如同梦中一般^{[2]69-70}。

一边是梦境般美好如画的山谷,一边是“饥肠辘辘”等候白人施舍的犹他族印第安人。这样的观察透露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据鲍尔斯考察,中部公园一带富饶美丽,却生活着比白人低一等级的原住民,实在是浪费大好资源。他随即列出数项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证明印第安人无法融入现代文明,其与白人接触会加速衰亡,由此提出种族隔离计划:“让所有犹他部落一起进入科罗拉多西南角,远离矿山和白人,在那里,在丰盛的牧场和富饶的山脉上过着游牧和半农业的生活;在政府的保护和帮助下,建立大规模的畜牧业,以及他们所能进行的耕种。”^{[2]79}

这种白人至上论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明等级观念,它强调种族因素对发展高级文明的重要性,并把“与土地的关系”作为文明与否的判断标准,为某些种族占据“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更优越的土地”制造了看似科学的论据。这种观念直到20世纪初仍然有很大影响力,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在1915年提出“文明的气候假说”,认为气候能量的分布与文明的分布之间呈正相关,但强大的种族却能提升“低气候能量区”的文明程度,比如被大英帝国统治的地区或被美国政府占领的南部地区^{[24]153-154},气候对文明的影响因素往往被种族因素超越。他以美国为例,说明白人到来之前的北美大陆作为世界上最优渥的气候区,文明程度却很低,原因在于印第安人“不依附于某片土地”的生存习性决定了他们无法形成高级的文化形态,也就丧失了文明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固定住所和个人财产价值^{[24]207-223}。

鉴于这一点,科罗拉多公园的风景描写其实是把一种“人为建构”自然化的结果。但仅透过观景者的视线,我们看不到风景背后的暴力和冲突。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派军队前往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印第安居住区,这些区域或是位于铁路公路交通线上,或是发现了矿藏或其他自然资源,为了给白人移民肃清障碍,联邦当局花大量费用发起针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一些酋长在威逼利诱下签订条约,割让了数百万英亩的优质土地,换来的却是保留地的劣等土地,许多年轻武士拒不遵守条约,继续在原领地游荡,伺机攻击白人,大大小小战争和暴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5]。其中,科罗拉多就是联邦政府与大平原印第安人最初展开战斗的地方,1864年的“沙溪大

屠杀”^⑬以白人矿工进入科罗拉多的印第安狩猎区为导火索,以数百名土著人遭到无辜惨杀而告终。鲍尔斯的种族隔离计划在这一情形下提出,与当时美国官方的印第安政策相一致,其风景书写也就显示出一种特殊用意,证明了“非我族类”不配享受拥有某块土地的权力。

内战结束之际,国会就原住民问题的处理产生了三种不同提案:武力遏制、和平教化以及消灭“不开化”印第安部落的政策。战后至19世纪末,联邦政府的印第安政策是武力与和平政策的结合^{[26]401-402}。其中,东部的社会改革家、印第安人利益的拥护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主张以西方文明和宗教“开化”原住民,其自由主义观念得到一系列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支持,如《国家》《哈珀周刊》《纽约时报》等;另一种截然相反观点的持有者是西部移民或与印第安部落交战过的士兵,他们认为对印第安人感情用事是愚蠢的,一些西部报刊也对“和平教化”政策作出反驳^{[26]403-410}。《堪萨斯每日论坛报》在1866年7月写道:“如果说这些魔鬼不被清干净,那么我们的前线地区就没有永恒、持久的和平。我们东部的伙计们兴许听到这种情绪表达会有些许讶异,但是他们要是在西部住上几个月,理解这些印第安人对西部地区的定居者和旅行者延续不绝的暴力侵犯史,那么东部人心目当中对于这些人的浪漫感觉也烟消云散了。”^{[26]409-410}

当“社会改革家们”真正去过西部并遇见印第安人,他们便立即撤回了原先的观点,马克·吐温在内达华做新闻记者期间接触过当地印第安部落之后,便由“印第安人的崇拜者”转变为“白人移民的同情者”,他在1862年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关于土著人的描述只为证明他们“天生卑劣”^[27]。佩吉·史密斯提到,在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当中,鲍尔斯的倒戈最为严重,这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编辑”在经过西部之行后,甚至坚持“对印第安人最仁至义尽的做法是让他们有尊严地走入坟墓”^{[26]410-411}。当鲍尔斯得知丹佛东部、北部和南部的移民定居点被夏延族、阿拉帕霍族和苏族等大平原印第安人袭击时,便公然鼓吹“种族清洗论”,直言用“和平政策”解决边疆暴乱是不明智的,并做出如下论证:

我们知道,他们与我们不能平起平坐;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有能力改善土地的种族,对土地的权利高于他们;让我们公开直接地履行我们的信仰。土地是耶和华的;由他赐给圣徒去改善和发展;我们就是圣徒。这一古老的清教前提和结论是我们人民的信仰与实践;让我们别再犹豫,向印第安人声明并采取行动。让我们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们监护的对象,我们的孩子,我们天命的牺牲品,是我们取代的对象,也是我们要保护的對象。我们希望在你们的狩猎场挖掘黄金、耕种谷物,而你们必须“搬家”。^{[2]124}

这段富有宗教色彩的言论读来似曾相识。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直言印第安人被上帝安置在新大陆时只有临时居住权,整个大陆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28],他指出印第安人处于蛮荒状态并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根源在于:他们以狩猎为生,不发展农业,因此丧失了土地。而这一观点可追溯至洛克,通过在劳动与土地所有权之间建立的关系,洛克把土地与北美印第安人割裂开来,在确立其“野蛮人”身份的同时,赋予欧洲殖民者“天然的”土地归属权。而这种“劣等”身份又成为印第安人必须接受基督教教化的根据。洛克在1668年至1700年间多次担任北美英属殖民地的事务官,他认为印第安人的心智就如同儿童,父母如果对儿童放任,就是让其“处于野兽一

^⑬亦称奇文顿大屠杀,1864年11月,美国陆军上校约翰·奇文顿率领兵团突袭科罗拉多东南部夏延族和阿拉帕霍族的村落,五六百名毫无防备的土著人被白人士兵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屠杀,其中三分之二为妇孺。该恶行随后激起幸存者和大平原其他部落激烈的反抗和报复。

样的不幸状态”^[29]。自殖民地时期起,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管制就在“监护与被监护”的模式下进行,独立后的美国政府沿袭了英国人以“父亲”身份处理印第安事务的做法,并利用这种“父权主义”(paternalism)占据原住民的土地,剥夺其权益,控制其自由。1831年的切诺基诉佐治亚州案和1832年的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定印第安部落属于美国的“国内依附族群”(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30],由于部落既非独立国家,也非从属国家,因此部落占有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属于美国,这就在法理上为“父权主义”制造了依据^[31]。

鲍尔斯所谓的“美国白人对土地的优先权”,建立在清教徒作为上帝选民的美国建国神话之上,而以“亲子关系”为由要求印第安人放弃所拥有的土地,接受白人“父亲”的教化,则是对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推行强权逻辑的复制。与同样被视为“劣等种族”的黑人相比,印第安人作为美洲大陆的原住居民,比白人移民更早“占有”美洲土地,而黑人则是被白人贩运至美国南方种植园充当劳动力,与美洲土地并无关联。因而由奴隶制引爆的“南北矛盾”可能致使美国分裂为两个国家,但“印白冲突”却关联着在“占领美洲土地”问题上结为利益共同体的盎格鲁-美利坚人的权益。对美国白人而言,印第安人不但是其征服之路上的障碍,需要以武力解决,而且对美国国家形成的正当性构成威胁,需要从文化上进行处理。

当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对抗在19世纪60年代被激化,内战后成为近在眉睫的国家问题时,南北矛盾便退居其后,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话语政治中,即印白冲突被放大和凸显,用来冲淡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根据1865年5月24日的书信,鲍尔斯一行人穿越堪萨斯北部和内布拉斯南部,沿着普拉特河前往丹佛的过程中,途经了被印第安部落袭击的区域,并获得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是收集到关于印第安人的大量罪证,主要是“他们去年在这条路线上发起的袭击,他们毁坏的房屋和烧毁的谷仓,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可怕的屠杀事件”^[11]。鲍尔斯向政府提议在主干道沿线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赶走或消灭印第安人,以维持大平原的通讯与交通稳定。其二是发现大平原军队中有两个步兵团来自内战中的南方叛军,鲍尔斯断定他们是欣然入伍为联邦服务,“他们拥有年轻而硬朗的外表;那位从旧邦联军队走出来的上校,打心底里作证他们对新部队的服从和支持。他们在军队中被称为‘被洗白的南部士兵’,并自称‘镀锌扬基队’”^[11]。

这段描述中出现了一正一反两方力量的对比。正面是维护共和国安全与秩序的白人士兵团,其中,重新加入联邦军队的“南方叛军”被置于醒目的位置,以彰显南北方在抵御“外敌”时已结成利益团体;反面是白人的公敌——印第安人,他们被定义为“十恶不赦”之徒。这里暗含一个结构的建立和另一个结构的瓦解:在面对印第安“他者”时,一种基于对异族的“共同仇恨”而产生的民族情绪得到激发,使“南北对立”轻而易举地被“南北联合”的新秩序代替,奴隶制引发的区域冲突被更为根本性的种族仇恨置换掉了。类似的叙事策略在鲍尔斯的书信中随处可见,其实质是用一种更为激烈的种族矛盾遮蔽刚刚过去的战争记忆,原因在于,无论南方人、北方人或西部移居者,在面对来自印第安人的暴行时持一致立场。

安东尼·吉登斯谈到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时认为,不论是良性或恶性的民族主义情感,其基本特征都是“对‘群体内部’的一种强烈的情感依附,与之相伴的是对‘群体外部’的区分或者排斥”^[32]。通过区隔“他者”来完成关于“自我”的定义,这是民族、国家、族群等范畴几乎都包含的一个基本结构,民族主义起源于对自我的想象,往往也从对他者的恐惧或憎恨中获取一种病态的“团结”。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尝试,既是内战后美国知识分子思考国家未来走向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

出于解决美国民族性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想象。正如方纳所认为的,“美利坚联邦在19世纪中叶所遭遇的危机,也是一场关于美国民族性内涵的危机,而内战则成为重新界定美国公民资格的一个关键时期”^[33]。1866年《民权法》及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使一部分非裔美国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公民权利得到确认,但属于部落的印第安人被排除在外,未经美国政府的归化程序无法获得公民资格。事实上,部落自治与同化印第安人之间的悖论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印第安政策中,使印第安人的公民身份获取充满了争议性。由于印第安部落拥有对美洲土地的控制权,从而对欧裔殖民者占据北美大陆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于是造成后者关于“土地归属权”的焦虑。虽然1887年《道斯法案》以土地的私有化摧毁了作为政治实体的部落,并规定了印第安人获得公民权的程序,但文化上的“他者化”持续至今。显然鲍尔斯笔下的印第安部落也折射出这一焦虑。

五、结语

内战后,美国国家认同在语言层面的一个明显转变是“美国”一词的系动词由复数变成第三人称单数^[34]¹⁷,对美利坚民族同一性的追问体现在政治的、文化的、想象的甚至科学的话语表述中。美国的民族性在暴力革命和领土扩张中被塑造,并通过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和新教价值观的证明得到巩固,独立革命、西进运动和内战无一不是创造和加强了这一叙事。而构筑其国家身份的文化记忆则是通过“遗忘”和“重塑”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虚构了一个关于美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故事。但南方和北方追求的“自由”和“民主”的差异性使这套叙事充满了破绽,最终“联邦的胜利将北方对自由的理解转化成为一种正常的国家模式”^[35]。

这种历史虚构和话语转向也体现在鲍尔斯的旅行书信中,他将一种“所属”的概念赋予不久前巧取豪夺来的土地,而一旦与西部的关系被这样定义,那么在夺取它(通过驱逐和屠杀原住民)、使它由分裂走向统一(通过一场血腥战争)、开发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剥削之上)的过程中使用的暴力就需要在国家记忆中遮蔽掉。如此构建的“新西部”显示为一个自然风光堪比欧洲的游览胜地,一片靠着白人的辛勤垦殖就能制造农业神话的区域,一块可实现经济独立和个人自由的土地。然而“镀金时代”的到来构成了对这幅理想图景的绝妙讽刺:横贯大陆的铁路加剧了资本投机和政治腐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一步挤压底层生存空间;平民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预示着美国社会结构的危机,揭露了西部的现实经济模式从来都不是乌托邦构想中的蓝图,除了黑奴之外,还掩藏着各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大平原假说使人们饱尝过度开发的恶果,西部脆弱的生态导致农民在贫瘠土地上耕种;被解放的黑人从南方种植园逃出,却被奴役进另一个更巨大的牢笼。这一切就像理查德·怀特《共和国的象征》一书影射的主题:内战后的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新国家,但远非他们所想象的那个,美国在19世纪末变得如此不同于林肯所预设的、共和党人自信创建的那个世界。

事实上,在19世纪的美国历史上,“西部”曾以诸多面貌出现,而非首次被“发明”。随着美国人对土地、贸易和商业投机的兴趣,以及外来移民人口的持续增长,西部还扮演了“安全阀”“世界花园”“农业乌托邦”“热带种植园帝国”等形象。这些形象从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出发,刺激了美国人向西挺进并夺取整个北美大陆。直到内战前后,美国的西部拓殖已无法剥离地渗入国家形成的历史当中,成为塑造民族性及文化认同的重要维度。当我们置入历史,在“西部”的脸谱中思考鲍尔斯关于帝国的假设,发现了同样的象征性内核。“新西部”孕育着战后美国人对现代国家的构想,所鼓吹的工业革命神话遮蔽了地理区域的复杂性,并通过对印第安人的他者化来淡化南北对立的战

争记忆,从而形成一种以“重聚”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国家意识。但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在相互矛盾的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博弈之中不断生成,战后初期北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认同话语很快被进步主义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思潮颠覆。即便如此,在大众想象中,“西部”作为一个古老诱饵的效力并未丧失,在美国迈向帝国之路的不同阶段,它不断被唤起,参与历史的重构和国家身份的重塑。

参考文献:

- [1] BOWLES S. Across the continent: A summer's journey to the Rocky Mountains, the Mormons, and the Pacific coast, with Speaker Colfax[M]. Springfield: Samuel Bowles & Company, 1865.
- [2] BOWLES S. The Switzerland of America: A summer vacation in the parks and mountains of Colorado[M]. Springfield: Samuel Bowles & Company, 1869.
- [3] BOWLES S. Our new West: Records of travel between the Mississippi river and the Pacific ocean[M]. Hartford: Hartford Publishing Company, 1869.
- [4] PASLEY J L. The tyranny of printers: Newspaper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1: 3.
- [5] 查尔斯·A·彼尔德, 玛丽·R·彼尔德. 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M]. 许亚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960.
- [6] 罗超. 美国内战后的南部记忆文化初探: 第一次“失去事业”意识与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J]. 历史教学问题, 2017(3): 76-82, 139.
- [7] MOTT F L, CASEY R D. Interpretations of journalism[M]. New York: F. S. Crofts & Co., 1937: 116-117.
- [8] MERRIAM G 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amuel Bowles, vol. 1[M].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885: 100.
- [9] FORNER E.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5.
- [10] 罗伯特·卡根. 危险的国家: 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下)[M]. 袁胜育, 郭学堂, 葛腾飞, 译.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291-304.
- [11] 雷·艾伦·比林顿. 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上册)[M]. 周小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456.
- [12] BENTON T H. Thomas H. Benton's speech on the Pacific Railroad Bill[M]//DANA C W. The great west, or the garden of the world: Its history, its wealth, its natural advantages, and its future. Boston: Thayer & Eldridge, 1861: 372.
- [13] GEORGE H. What the railroad will bring us[J]. The Overland Monthly, 1868(4): 297-306.
- [14] W. J. T. 米切尔. 风景与权力[M]. 杨丽, 万信琼,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15] WEBB W P. The great plains[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1.
- [16] GILPIN W. The central gold region: The grain, pastoral, and gold regions of North America[M]. Philadelphia: Sower, Barnes & Co., 1860: 120-127.
- [17] 马林. 美国大平原旱农地区的社会状况[J].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1999(3): 88-92.
- [18] 唐纳德·沃思特. 尘暴[M]//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 侯文蕙,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19] U. S. General Land Offic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General Land Office for the year 1867[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7: 153.
- [20] SMITH H N. Rain follows the plow: The notion of increased rainfall for the great plains, 1844-1880[J].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947, 10(2): 169-193.
- [21] WRIGHT J K. Geographies of the min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19-147.
- [22] 钱满素. 自由的刻度: 缔造美国文明的40篇经典文献[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280
- [23] DEVOTO B. The course of empire[M].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2.
- [24] 埃尔斯沃斯·亨廷顿. 文明与气候[M]. 吴俊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25] 丁则民. 美国通史(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16-123.
- [26] 佩吉·史密斯. 悲剧遭遇: 美国原住民史[M]. 郭昊天,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 [27] DRISCOLL K. "Blind in Nevada" in Mark Twain among the Indians and other indigenous people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53-92.
- [28]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 董果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33.

- [29]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0.
- [30]KETTNER J H.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1608-1870[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8:296.
- [31]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223-224.
- [32]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01.
- [33]埃里克·方纳.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M].王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19.
- [34]WHITE R.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ilded age, 1865-1896[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35]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Letter from the West” and America’s nation-building: A study of Samuel Bowles’ s *Our New West*

JIA Y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P. R.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ivil War, travel letters about western sketch emerged in major newspapers. Journalists,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reshaping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landscape, “letters from the West” served as a cultural vehicle of American identity in this sense. As a journalist for *The Republican*, Samuel Bowles joined two trips to the West hosted by federal officials in 1865 and 1868, his travel letters based on these trips we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ime and then collected into *Our New West*. Among them, the accounts of the Pacific Railroad, the Great Plains and Indian tribes provide an entry point for war-torn Americans to revisit and reimagine the Republic. First, Bowles takes the Pacific Railroad as a civilized bond to unite the states, and through the “fractur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triggered by “railway modernity”, he urges people to forget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And then he presupposes a “unified imperial landscape” under American Manifest Destiny, aiming to pave a way for the new national identity. Second, the author’s the image of the Great Plains changes from “great desert” to “great pasture”, and the myth of “wilderness turned into a garden” helps to arouse American’s desire to conquer the “last frontier” and thus the entire continent. The indivisibility of the Union is reaffirmed both in geographic space and cultural symbolism. Finally, the migrations and wanderings of Indian tribes in the West are treated as a particular cultural landscape to support the white supremacy and emphasize that Anglo-Americans naturally have sovereignty over the land of America. The racial hatred stirred by the exaggerated Indo-White conflict in the text, weaken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on the one hand, and defines the national self while imagining the “savage oth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st is portrayed as a site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the epitome of a “continental empire”, and the God-given “Promised Land” for the Puritans. In this way, the author builds a national vis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mmunity focusing on “reunion”. But such a “New West” conveys the intellectual order established by the conquerors (white settlers) and the victors (the Union or the North), the resulting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the press appears to integrate conflicting localism and stimulate an identical Americanness, but in fact cannot heal the divi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view of capitalist progress, hypothesis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 that it promotes exacerbated social unrest during 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reveal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secession crisis in America’s nation-building.

Key words: post-Civil War; “letter from the West”; Samuel Bowles; “New West” landscape; identity discourse; nation-building